

· 讨论篇 ·

关于日军编制和军衔译名问题的讨论(续)

日军编制译名以直译为好

高晓星

《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1期登出了几篇关于日军编制和军衔译名问题的争论文章,看后颇有感触,我也想就日军编制译名谈点个人看法。

我认为,对日军编制和军衔还是以直译为好。中国过去绝大部分的档案、书籍、文章均是采用直译的方法,一般中国人都能看懂。我在编写《民国海军的兴衰》和《民国空军的航迹》两本书时,均采用了直译方法。当然,对于个别容易产生歧义的地方,仍可采用意译,但总体上还应直译。直译方法比较能客观反映日军编制发展演变和各军兵种的特点,理由如下:

首先在历史上,日军的编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日本陆军航空队来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其航空兵团下辖3个飞行团、关东军飞行集团及2个直属联队,共有16个飞行联队。一般是1个联队辖2个大队,每个大队辖2个中队。但有的联队下边没有大队一级编制,直辖2—3个中队。后来,日本陆军航空队将大队编制取消,改由几个中队组成1个战队,由几个战队组成飞行团,由几个飞行团组成飞行集团。其后,日本陆军还组设了飞行师团、航空军等编制。对于日本陆军航空队编制,如果意译就十分困难。日军1个战斗机中队有在编机12架及预备机8架,实力与我国现行空军编制中的飞行大队相当,应译成大队。但如那样译,又与日军原有的飞行大队混淆了。如照意译,日军的飞行大队、飞行联队,均应译成飞行团,因为其大队仅为2个中队,联队为4个中队,而我军1

个飞行团也是 2—4 个大队。这样就会产生混乱。再说,如果飞行联队译成了飞行团,后来的飞行战队译成什么呢?按实力还应译成飞行团,这样就又看不出日本陆军航空队的编制演变情况了。还有,日本陆军的飞行师团实力相当于我空军的军,其航空军实力与我军区空军相仿,是否能意译成“军”和“军区空军”呢?我看不能。在历史上,日本军队其他部队编制也都有过变动。所以,对日军编制还是直译才能反映其编制变化状况。

其次,日本军队不仅有陆军,还有海军,陆、海军中还各有航空队,对其编制和主官名称只有直译才能比较如实地反映它们的各自特点。比如航空队,日本陆军以中队为基本建制单位,而海军则以航空队为基本建制单位。它们的实力虽然差不多,但编制却不同。其主官,陆军称为中队长,而海军则称为航空队司令。日本陆军飞行联队(或战队)主官为联队长(或战队长),而海军 2 个以上航空队组成的联合航空队(或战队)均称为司令官。日本陆军飞行团、集团、师团主官分别称为团长、集团长、师团长,而海军航空舰队主官则称为司令长官。日本陆、海军航空队不仅编制不同,就连飞机型号也无一相同,如果按我军编制或所谓“国际通行军语”意译成一样的编制,就难以区别它们之间的差别,所以,还是直译为好。

顺便说一点,我们在研究历史时,应尊重历史,尽可能还历史本来面貌,才能客观、公正地分析和评价历史。如果对历史上已存在过的名称都随意改来改去,势必会造成历史的失真。如在我军历史上曾用过“军团”、“纵队”等编制名称,我们应该照原样反映,而决不能改成“集团军”或“军”等名称,否则,把红一军团称作“红一集团军”,把两广纵队称作“两广军”,岂不造成混乱?同样道理,把已成为历史的日本军队的师团译作师,旅团译作旅,联队(应统一译为“联队”,不译“连队”,以免与我国连一级建制混淆)译成团,大队译成营,中队译成连,小队译成排等也是不妥的。即使在今天的中国和世界的许多国家军队中,编制也不是千篇一律的,都是根据

国防需要和军队实际情况不断调整的。既有称作班、排、连、营、团、旅、师、军的；也有称作分队、区队（或小队）、中队、大队、支队（总队）的；还有叫××集团、××作战群……总之，每一国家军制都有自己的特点，谁也不能用一种军制名称强制统一各国军队的名称。因此，我主张对历史上日军编制名称直译，使其保有日军的特色。

（作者单位：南京海军指挥学院）

也谈日军编制的译名问题

周 启 乾

顷读 1994 年第 1 期有关日军编制和军衔译名问题的讨论，虽有文章力主改变旧译，使用通用军语，但笔者不敢苟同，而基本赞成邹念之、张振鹄等先生的意见。愚意以为，我们目前虽然可以继续探索更为恰切的译法，但是，在还没有得到满意结果的情况下，当仍以尊重传统译法为宜。

关于日军编制“对译”为相应的中国军队编制的作法，笔者亦以为两国情况不同，难以作到真正对应。以日军“师团”而言，即绝对不能简单地译作“师”。与“师”相比，它更接近于“军”。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它只有 17 个师团，师团长由陆军中将担任，系天皇亲自任命，并直接隶属于天皇（只有驻朝鲜的两个师团隶属于“朝鲜军”）。就这一点而言，即表明其在军队中的地位高于陆军次官及参谋次长等。以 1936 年的第一师团为例，其定员 11856 名，所属步兵第一、二旅团，定员分别为 3997 名，每个旅团下属两个步兵联队，每个联队定员 1996 名。可见，日军编制与中国军队编制并不相当，把“师团”、“旅团”、“联队”分别译作“师”、“旅”、“团”乃是极不妥当的。

日军平时的组织，在“师团”之上还有“军”，但仅限于本土以外

的占领地区,如“朝鲜军”、“台湾军”、“关东军”、“支那驻屯军”(“天津军”),它们的情况各不相同,其中只有“朝鲜军”拥有常设师团,而其他“军”的兵力则并不一定比“师团”大。可见,这些“军”是以占领地及执行的特殊任务而命名的,因此不能不问时间、地点,一概把“军”的概念理解为“集团军”。以“中国驻屯军”为例,它于1936年得到加强,始达到“独立混成旅团”的程度,次年便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此后,日本即大量设置“军”,所有“师团”均隶属于它,至太平洋战争开始时,已有22个“军”,至战败前夕,更达48个“军”。

与平时不同的是,在1937年侵华战争全面展开以后,日军又在“军”以上设置了“方面军”,至战败前夕,达到17个“方面军”。在“方面军”之上还有“总军”,它是日本陆军的最大组织,如日俄战争时的“满洲军”即相当于此。在太平洋战争开始时,有“中国派遣军”和“南方军”两个“总军”,至战败前夕,则有“第一总军”、“第二总军”、“关东军”、“中国派遣军”、“南方军”、“航空总军”计六个“总军”。就“关东军”而言,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它从“军”升为“方面军”乃至“总军”,也就是说,1931年时,它只指挥一个师团,另有守备队隶属其下,是一个小规模“军”,但是,1938年则膨胀为八个“师团”,1939年时,它即相当于拥有两个“军”司令部的“方面军”,而1942年则更发展为拥有两个“方面军”的“总军”。在此期间,它的名称虽然始终是“关东军”而未改变,但成为“总军”后,军司令部改称为“总司令部”,军司令官改称为“总司令官”,参谋长改称为“总参谋长”……缕述这些情况是为了说明,难以为上述词汇另找合适的对应译名,而是沿用日语汉字的表达,并在必要时辅以适当的注释,才有助于准确反映和理解日军编制的实际状况。笔者以为,这当比勉强“对译”而不能准确表达原意要好得多。

其实,不仅日军的编制与军衔的译名有这样的问題,由此引伸开来,许多日语汉字词汇的翻译同样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当年作为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的石原莞尔,在策划与发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乃人所共知,但是,若把“课长”简单化地“对译”为“科长”,那

么距离实际就相去太远了。因此,在翻译时仍以保存其本来面貌为宜。

为了学术研究与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对于此次所讨论的译名问题,愚意以为应该集思广益,审慎处理。在还没有找到更为合适的解决办法之前,莫如仍然沿用原名,以免造成新的混乱。*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从中日军队实力对比看日本军制 部分用语的译名问题

赵廷庆

军队编制和军衔是军制的组成部分。近代各主要国家的军制既有其大体相近的一面,也有各具特点的一面,若能系列对应地用中国军语或所谓各国通用的军语进行移译,自然很好。但日军的军制特别是编制,在三四十年代,与同时期的中国军队相比,差异太大,难以一一对应。而在编制系列中处于关键环节的是日军“师团”和华军“师”的关系,如果这两者弄清了,则其他编制单位和军衔等不难解决。我们就侧重于这两个编制单位,对中日两军的编制结构等作一些分析。

就师团来说,它是日本陆军中平时最大的各兵种合成的部队,是可以独立遂行作战任务的战略单位。在战时,适应不同情况的需要,其编制规模、内部结构、武器装备有很大变化。我们试以 1937 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前夕日军师团和华军整理师的人员、装备定

* 主要参考资料:伊藤隆监修、百濑孝著:《事典·昭和战前期的日本》,[日]吉川弘文馆 1990 年版。

制列表进行比较。

日军常设师团与中国军队整理师人员装备比较表^①

类 别	日 军	华 军	比 率	备 考
人 员	21945 (人)	10923 (人)	2 : 1	
马 匹	5849 (匹)			
步、骑、手枪	9476 (支)	3821 (支)	2.48 : 1	
掷 弹 筒	576 (支)	243 (支)	2.37 : 1	
轻 机 枪	541 (挺)	274 (挺)	2 : 1	
重 机 枪	104 (挺)	54 (挺)	1.93 : 1	
榴弹,野、山炮	64 (门)	16 (门)	4 : 1	
团 营 炮	44 (门)	30 (门)	1.47 : 1	
战 车	24 (辆)			
汽 车	262 (辆)			系日军炮兵联队之装备
自动货车	266 (辆)			系日军辎重兵 联队之装备
一马曳车	555 (辆)			

① 本表系参照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五册上)第118页表制成;比率栏为笔者所加。

从上表可以看出,日军师团定员是华军师团的两倍还多一点。应当指出,华军师的人数只是充其量不过 20 个整理师之定员。七七事变爆发时,中国军队共有 182 个步兵师^①,其中除第二十九军所辖 4 个步兵师,每师 4 个旅,共 15000 多人,这种在华北特殊背景下形成的特殊情况外,绝大多数师都不过几千人。开战时中国陆军约有 170 余万人。^②182 个步兵师加上步兵独立旅、骑兵师、骑兵独立旅以及其他陆军特种兵,共约折合 230 个师左右,若照 170 万平均,则每师只有不足 7400 人,若照 180 万陆军计算,每师平均亦不满 8000 人,至于在平均数以下的师则不过五六千人。

当时日本陆军常设师团 17 个,现役兵 38 万人,平均每师团 22000 多人,可见其各师团都是充实满员的。值得一提的是,日军每个作战师团都配属相当数量的补充兵员,以便在作战损失后及时补充,特别是其战时主攻师团配备野战重炮旅团或野战重炮联队及其他特种兵,可达 3 万多人,这样的师团与中国军队一般的非整理师人数相较,就远不止两倍、三倍的比例了。

既然师和师团各自的总人数差距悬殊,那么其下各级的编制,除了两国军队的最小战斗单位“班”(中)和“分队”(日)人数均在十一二人以外,其他自然也都有相当大的差距。日军一个小队约 70 人,一个中队 200 余人,分别为中国军队排、连的 2 倍。1938 年被俘的日军板垣师团长野联队年田大队中村中队永田小队的士兵玉利陆夫当时供述的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据该士兵说,他所在的部队每分队十一二人,每小队六个分队(其中第五分队为机枪分队,其他各分队为步枪,每小队有 2—3 支掷弹筒),总计 70 余人。由于在编制上高层的师团对师、基层的小队对排成二倍或二倍以上的比例关系,日军各级建制,与中国军队建制对应,也存在相应的倍

① 当时步兵师数量有 180 个、182 个、183 个等不同说法。此据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一书的统计。

② 另说 180 万人,此据何应钦、陈诚等人的说法。

比关系,故不能随意等同对译。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特别是抗战后期,日军由于重武器不足以及出于“警备”其广阔占领区的需要,师团等编制单位有编制规模小型化、武器装备轻型化的趋势,但中国军队师的兵员也在减少,除了特别加强的缅甸远征军等部队的少数师每师达 13000 人外,一般师的实际人数大抵在 6000 人左右。这个数字与日军对“蒋系军的战力观察”也大致吻合。其华北方面军于 1941 年 7 月形成的《呈报总军情报会议文件》中说:蒋系军“80%的部队每师(引者按:顺便说一下,这里的“师”是该文件的原称。当时日军文件都是把中国军队的建制师直译为“师”,而不译作“师团”,此点亦值得我们注意、参考)兵员平均为六七千人”。^①

另外,如果说中日两军在通常被人们认作是同级部队的人员数量差别如此之大,那么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就更为悬殊(比率见表)。

日本陆军师团是多兵种合成的部队,通常主要由两个步兵旅团、四个步兵联队、四个特种联队组成,各特种兵联队还分别编入同兵种后备中队两个,即总数八个后备特种兵中队。中国军队即使编制相对比较齐全的整理师,特种兵也很少。按整理师定制一个师编有一个师司令部,两个步兵旅辖四个步兵团,炮兵、工兵、辎重兵各一个营,骑兵一个连(通信、卫生兵种的对比从略)。除步兵旅、团按计划编制外,骑、炮、工、辎等特种兵营、连,有些并未全部按编制计划到位,即使全部到位配备,以这样微弱的配备还抵不上日军师团上述八个特种兵后备中队的战力,远远谈不上多兵种合成。尤有甚者,由于日本的空军分别属于陆、海两军,其陆军师团作战时都配属航空兵,飞机一般数十架,多则上百架。

人员数量特别是武器装备的数量质量的巨大差异,必然造成中国师对日本师团在综合战力上的巨大差距。堪称当时中国军队

① (日)《现代史资料》(9),みす书房 1973 年出版,第 493—494 页。

中最精锐部队的汤恩伯第二十军团抗战初期的一份战斗详报就曾指出：“我军师之装备就目前补充不易，以调整师之装备概况计之，所属各种炮在 40 门以下，步枪约在 3000 枝以下，轻机枪约在 250 挺以下，重机枪约在 50 挺以下……可判明敌军之一师团足当我调整师三倍以上，假使我军非调整师之编制者其相差当更悬殊矣。至于人员一层无论敌之师团为 15000 左右乃至二万余，通常我军作战以一两军之众而与敌之一个师团作战殊无比较人数多寡之必要”。^① 这时的汤恩伯军团作战还比较积极，而且是战役之后的冷静分析，还不致故意夸大敌人战力，因此，我认为他的上述判断是可信的。

由于中国师与日本师团兵力的实际差距，日本一些侵华战争文献和有关论著多将美苏等军的师译作师团，对中国师则多径直移用，而不译作师团（尽管也有少数译为师团的例子），恐怕对二者的差异之大不是没有考虑的。有的学者估计，抗战开始时，中国的一个整理师可抵住日军常设师团的一个联队，而到 1943、1944 年，需一个军方能对付日军一个联队。^②

世界各军事大国都以师为战略单位，中国军队也曾以师为战略单位，但正如陈诚在其《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一书中所说：中国的师“尤以重武器缺少，不足以组成战略单位之火力”。因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1938 年 11 月举行的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在决定减少指挥层次，废除兵团、军团两级建制的同时，改以军为战略单位。蒋介石 1941 年 7 月 13 日在给何应钦的手令中，又进一步强调“军为战略单位，应速谋充实军部之组织，能使其确实具备战略军之性能”。他并指示“须将现行师直属之特种兵特予编组，隶属军部，以达成战略单位之目的为要”。^③ 可见，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在反侵略

① 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廿五)334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参见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稿》第 3 卷，中华书局 1991 年出版，第 605 页。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一），第 349 页。

战争实践中已经意识到并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国的师与日本的师团在部队结构和战略地位上不处于同一个等次,而采取了弱化师、强化军的具体措施后,使本来就很弱的师与日军的师团差距更大了。

从另一方面看,日军也不承认华军的师与其师团处于同一个编制级别。这除了它极度蔑视中国军队战力的心理因素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日本从其天皇制现代陆军开始建立时起,就把它的“师团”,视同外国的“军”级编制。19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以陆军次官桂太郎和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为主进行军制、军备的全面改革,在编制上,废“镇台”,设“师团”,规定“师团长由天皇亲自任命,师团是战略单位,相当于外国的一个军”。^①这一制度的主要方面大体上沿袭了下来。其后,日军自身与美、德、苏、英等军事强国的军队编制如何衔接姑置不论,至少在其长期的侵华过程中,它从来也没有把中国军队的师视同它的师团级编制,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从各种因素的综合分析来看,至少在1945年日本投降之前,中日两军编制中比较相近于同一个等次的单位是中国的军和日本的师团。二者都是各自国家军队中平时具有固定编制的最大也是最高层次的部队建制,尽管在武器装备和综合战力上,军也不能完全与师团相当,但综合其他条件,差可接近。如此说来,是不是要把日军的编制名称“高套一级”进行翻译呢?那倒也不必。那样,“实”可能比较相符了,但“名”会出现新的混乱。从“名”即师的本来应有的意义上说,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确曾想按照较高的标准整编名副其实的陆军师。拟议中的每个整理师的武器装备为:步枪7831支、马枪1395支(野炮装备者)或1503支(山炮装备者)、驳壳枪2940支、手枪108支、重机枪92挺、轻机枪294挺、步兵炮20门、山炮36门、野炮36门、2生的小炮30门、15生的榴弹炮4门,全师人员14483名。配备野炮团的新编师人员达

① 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1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出版,第220页。

17170 名、马 3405 匹,配备山炮团的新编师人员达 17584 名、马 3387 匹。且准备从德国购买 40 个师的现代化装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虽说一个师也还不能完全抵得上日军一个常设师团,但比起后来实际编成的师确是大大接近了。若果如此。将日军师团译作师,基本上应该是可以的。然而那毕竟是“纸上谈兵”,凝固的历史不容假设。由于中国的国力状况和国内、国际的特定政治历史背景,中国军队的实际情形及其与日军的对比关系,大体上只能是上述那种状况。

我们再分析一下师团和师的主官的情况,或许有助于从另一个角度印证前面的结论。世界各国师级部队的主官一般多是少将,中国的师长也是如此,虽然 1935 年制定整军方案时曾计划师长为中将衔,但后来并未实行。而日军的师团长则例由具中将衔者担任。少将衔师团长也有,如侵华战争后期由独立混成旅团扩编为师团,原旅团长暂充师团长,因而为少将衔。这是极个别的破例,此外陆军师团长概为中将。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日本政府和日军中央部的要职可以直接由师团长不次超擢,例如参谋次长多田骏、日本内阁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乃至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等,都是由师团长转任的。对于中国的师长来说这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事情。日本战时的军司令官乃至有些方面军司令官都可以由中将衔者出任,如上所述,如无特殊情况,师团长一定要由中将担任。这些现象可以反证日军中师团这一级的位次决非中国军队的师所可比拟的。

上述种种情况足以说明,虽然师团与师形式上似乎相似,实际上却大相径庭。因此,“师”并不是“师团”的等值译名。这一级定了位,其下各级除了日军“分队”与华军“班”可以互译外(在实际翻译中,整个编制系列用一种译法,单独挑出一个名称,采用另外一种译法,这样是否妥当另作别论),其他“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也难以与中国的“旅、团、营、连、排”互译。不过旅团至小队这几级的情况不象师团那么复杂,因为日军师团除步兵、特种兵联队

外,还拥有中国师没有即或有也极少的直属单位,特别是战时配属部队和前文未曾提及的文职编外人员、配属部队可达十四五种之多,文职编外人员少者数百,多者千余。正是多种因素造成日军师团对华军师的悬距。其他编制单位虽不如师团这么复杂,但与人们主张用中国军队编制用语对译的相应单位相比,差距依然很大,例如日本步兵旅团的人数远超出中国的旅,与中国的许多非整理师大体相当或者接近,至于武器装备,华军的旅更是无法与之颉颃。若较以比一般步兵旅团加强了独立混成旅团,差距就会更大。所以用“旅”翻译“旅团”也不合适。联队以下也大率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勉强搬用中国军队编制用语套译日军编制名称,势必造成译名形式上的统一,内容上的混乱、失真,给人们如了解中日两军的部队状况、作战能力,从而对双方军事行动特别是一些重要战役乃至战争进程的正确认识和评价带来一些人为的障碍。我主张传统译法,基本的判断前提是中国的“师、旅……排”这个系列的译名与日本军队的“师团、旅团……小队”这个编制系列的名称,二者不等值,因此在使用传统译名时可根据行文的方便,加以适当形式的文外注释或文中说明。新译法论者的判断前提是上述二者等值或基本等值,因此无需加注。那么使用这种“通用军语”译名的作品就向广大不了解当时中日两军人员编制等实际情况的读者传输了错误的信息,使他们特别是青少年读者可能产生困惑、怀疑,他们会想,中国军队是不是“太脓包了”,事实上我就遇到过这类读者的发问。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在设计布置陈列内容时,特意加了一个“中日军队编制装备对照表”,使众多的非专业参观者由此可以避免从中国军队“师”和日军“师团”表面数量的对比可能造成的错觉,认识到中国军队以十几个师对付一个半师团的日军能取得那样的战绩也是很了不起、很不容易的。传统译名有利于读者实事求是地了解中日两军的状况,有利于他们正确认识两军的强弱对比。

主张“通用军语”译法的学者可能会说:新译法也可以加注说

明嘛。前已论及,新译法的前提是译名与原名等值,有的主张新译法的论者说是“类似”,意思差不多。既然如此,就不需要再添蛇足。有些译、著在行文中直接括注“师团(相当于师)”之类,显然是强调其同而不及其异,也说明了这一点。再说,若新译法也需要加注,以说明二者的区别,这就等于承认新的译名与原称是不等值的,近乎这种译法的自我否定了。

当然,传统译法也未必理想,或者说有它的缺点,但其缺点不在于有些学者指出的“不准确,不科学”,恰恰是它相对比较准确,既然真实和准确是科学性的基本要求,当然也就不能说它不科学。在我看来,传统译名的真正缺点在于它不能让不熟悉日军编制的中国读者根据自己所熟悉的参照系,一望而知其所译事物的质、量、态,质言之,就是不够显豁、不够通俗。但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情,在没有更理想的译法之前,只好借用原称直译,模糊一点。而它的好处则在于它从实际出发,承认、至少不回避、更不混同二者之间的重大差异,也不会向读者传输错误不实的信息。若加上注释或说明,易于引起读者的注意;不加注,也不致造成误解。读者如能理解,当然最好,如不了解,有注阅注,无注,可询可查,如暂时不愿索解求知,充其量停留在不懂的状态,但决不致造成象看到新译名那样望日“名”而思中“义”的误会。

日文汉字在翻译中有时会带来一些麻烦,但事物的利弊往往共存相生,它有时也能提供一些方便。且不说早已变成汉语的有机组成部分、国人几乎已经感觉不到是舶自日本的外来语的那一部分,一些日本独有而中国没有对应的名称加以翻译的事物,例如三句十七音的俳句,直接照“俳句”二字译过来,不但十分便当,而且简洁雅致。与此类似的西方“十四行诗”就没办法译得这样雅洁,只好要么用“十四行诗”这样质拙的译名,要么用更笨拙的音译,把意大利的十四行诗译作彼特拉克体,把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译作伊丽莎白体。在不致造成误解和歧义的前提下,在所谓传统译法中有选择地使用日文汉字,不但方便准确,有时还能传达出日本军政制

度、历史文化特有的“味道”。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准确,如果不准确,不论新译名、旧译名,都难站得住。传统译法也不是一切照搬日文汉字,泥旧不化、泥外不变,“连队”不是早就译为“联队”了吗?若有更好的新译法,人们也不会老拥着弊帚不放的。

中日“十五年战争”特别是八年抗日战争是影响中国和日本历史命运的事件,有关这个历史时期日本军队的编制、军衔等军制用语,不论在过去、现在乃至相当久远的将来,使用频度很高,影响很大,也很广泛,不限于学术界,更不限于史学一个领域,译名的改变,还是以慎重为好。

(作者单位: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